

百年屈学问题疏证

王 志 著

上海三联书店

百年屈学问题疏证

王志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年屈学问题疏证/王志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5. 4
ISBN 978-7-5426-5109-9

I. ①百… II. ①王… III. ①屈原—约前 340~约前 278—
人物研究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43066 号

百年屈学问题疏证

著 者 / 王 志

责任编辑 / 殷亚平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24175971

印 刷 /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1240 1/32

字 数 / 250 千字

印 张 / 14.625

书 号 / ISBN 978-7-5426-5109-9/K·314

定 价 / 48.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66019858

本书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资助

项目题名:《百年屈学问题疏证》

项目批准号: 11YJC751086



代 序

两千多年来，人们在屈原的先世、生平、职官、思想、人格以及辞赋创作等研究方面，积累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屈学”。尤其最近一百年来，随着中西文化交流在新时代的展开，有关屈原的学术话题一方面层出不穷，一方面提出后便往往得到较为深入的讨论。鉴于相关讨论学界的系统介绍已颇为不少，是故拙著并不准备对百年屈学做全面的学术史的梳理，而只想就其中较为紧要而著者又有些许拙见供人讨论的一系列问题加以条疏分辨。关于屈原作品的分辨，另见著者的《屈赋论笺》；本书则主要论人。

应该说，研究屈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宋费衎《梁溪漫志》载：“有士人尝以非辜至讼庭，守不直之。士人愤懣，大声称屈。守怒曰：‘若为士，乃敢尔！为我属对，不能，且得罪。’因唱曰：‘投水屈原真是屈？’士人应声曰：‘杀人曾子又何曾！’守曰：‘吾句有二屈字，而汝句尾乃曾（原注：音层）字。汝之不学明矣，顾何所逃乎！’士人笑曰：‘此乃使君不学耳！按屈姓，流俗皆如字呼，而屈到、屈原，皆九勿切。使君研究否？’守惭，释遣之。”唐颜师古《汉书·高帝纪》九年楚大族屈氏注，《古今人表》屈完注，皆云：“屈，九勿切。”由此可见，关于屈原，几乎处处都有学问。元吾衍《闲居录》载：“越王桀仲不能通训诂，见古书辄不悦。一日见《楚辞》，叹曰：作文如此艰澁，宜乎投水死也！闻者笑之。”王生固然可笑，不过屈

原之研究确乎难矣！

为了更好地研究屈原，勤读、勤思、勤写，我以为都是十分必要的。

一 勤读

研究屈原及其作品，有两种基本方法。一个是“走”，即对产生屈原及其作品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做实地调查；一个是“读”，即广泛涉猎与屈原相关的文献及其研究成果。这两种方法司马迁早就用到了，从而写出不朽的《屈原列传》。司马迁对屈原的实地考察主要还是屈原长期浪迹的沅湘一带，今人则走出湖南、走出中国、走出亚洲，将屈原及楚辞所产生的文化环境与世界各地，尤其是亚太地区的一些部落文明作比较，其成果已多半结集出版，形成文献资料。所以现在对于一般的楚辞研究者来说，主要的研究途径就是“读”了。读书要勤。李白不是说“书山有路勤为径”吗？屈原及其作品也是一座山，而且是非常险峻的山，但是我们不用怕。因为自汉代以来，学者们筚路蓝缕，为我们开辟了可走的道路千条万条。所以我们研究屈学的困难较前人小多了。只要我们勤读，而且善于选择蹊径，就一定会有所得。

古来与屈原及其作品相关的文献虽然比较多，但大要可以分成五类：关于屈原的传记类研究、关于屈赋的考释类研究、关于屈原与屈赋某一方面的专题类研究和涉及多方面的综合类研究，此外，则还有屈学史的研究。

关于屈原生平的传记，早期文献主要有司马迁的《屈原列传》、刘向《新序·节士》、东汉王逸《楚辞章句》中的一些序文。当然，屈原自己所作《离骚》和《九章》等作品也多少透露出诗人的一些人生轨迹。后人研究屈原的思想与生平，主要也是依据这些文献。

关于屈原的作品，最早进行传诵与说解的，大概是追随在屈原

身边的一些楚地父老及屈原的后学宋玉等人。西汉刘安的《离骚传》是现存文献中最早的关于屈原作品的解说,但只有部分内容残存在司马迁、班固等人关于屈原及其作品的论著中。^①班固《汉书·地理志下》谓:“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其失巧而少信。”严助、朱买臣与刘安,都是汉武帝时的人物。严助、朱买臣传《楚辞》是“巧而少信”,而刘安的注释从班固《离骚序》所引述的内容来看,也多有谬误,可见楚辞之学在西汉已经是堂奥难窥。其后扬雄、班固、贾逵等人也都对屈原的作品做过一些注解,然其书皆不传,只有部分说解被王逸采入了《楚辞章句》。

王逸生当东汉中叶,是朝廷的校书郎,有查阅图书之便。同时,他又生在南郡之宜城(今湖北宜城),而宜城是楚故都之一,所以王逸明晓屈原作品所用方言的涵义,解说颇有益于后人。他的《楚辞章句》也是古代最权威的楚辞注本,可惜该书在流传中曾遭后人的一些改动。关于《楚辞章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

逸字叔师,南郡宜城人。顺帝时官至侍中。事迹具《后汉书·文苑传》。旧本题“校书郎中”,盖据其注是书时所居官也。初,刘向哀集屈原《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宋玉《九辩》、《招魂》,景差《大招》,而以贾谊《惜誓》,淮南小山《招隐士》,东方朔《七谏》,严忌《哀时命》,王褒《九怀》及向所作《九叹》,共为《楚辞》十六篇。是为总集之祖。逸又益以己作《九思》与班固二叙为十七卷,而各为之注。其《九思》之注,洪兴祖疑其子延寿所为。然《汉书·地理志》、《艺文志》即有自注,事在逸前。谢灵运作《山居赋》,亦自注之。安知非用逸

① 郑良树先生认为,刘安的《离骚传》包括了叙论及章句解字。至今刘安还有一些解说《离骚》、《九歌》、《天问》及《九章》的文字保存在《淮南子》中,详见氏著《辞赋论集·屈原赋与淮南子》,台湾学生书局1998年版,第1—13页。

例耶？旧说无文，未可遽疑为延寿作也。陈振孙《书录解题》载，有《古文楚辞释文》一卷，其篇第首《离骚》，次《九辩》、《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隐士》、《招魂》、《九怀》、《七谏》、《九叹》、《哀时命》、《惜誓》、《大招》、《九思》，迥与今本不同。兴祖据逸《九章》注中称皆解于《九辩》中，知古本《九辩》在前，《九章》在后。振孙又引朱子之言，据天圣十年陈说之序，谓旧本篇第混并，乃考其人之先后，重定其篇第，知今本为说之所改。则自宋以来，已非逸之旧本。又黄伯思《东观余论》谓逸注《楚辞》，序皆在后，如《法言》旧本之例，不知何人移於前。则不但篇第非旧，并其序亦非旧矣。然洪兴祖《考异》於“离骚经”下注曰：“释文第一，无经字。”而逸注明云：“离，别也。骚，愁也。经，径也。”则逸所注本确有“经”字，与释文本不同。必谓《释文》为旧本，亦未可信，姑存其说可也。逸注虽不甚详赅，而去古未远，多传先儒之训诂。故李善注《文选》，全用其文。《抽思》以下诸篇注中，往往隔句用韵。如“哀愤结縲，虑烦冤也。哀悲太息，损肺肝也。心中结屈，如连环也”之类，不一而足。盖仿《周易·象传》之体，亦足以考证汉人之韵。^①

王逸《楚辞章句》虽是汉代楚辞学的集大成者，^②但也不是没有纰漏和错误，所以到南宋，洪兴祖乃作《楚辞补注》。兴祖字庆

① 黄灵庚先生认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刘向集《楚辞》十六篇，并无文献依据。又谓王逸《离骚后叙》所谓“刘向典校群书，分为十六卷”，乃是分《离骚》为十六章。又谓王逸《楚辞章句》原只有十一卷行世，今本《七谏》、《九叹》、《哀时命》、《惜誓》、《大招》、《九思》序文及章句“盖为其子王延寿或王逸之后东汉一无名氏所作，然犹托名为‘校书郎中王逸作’也”，至隋时才与十一卷本合编成十七卷本。说见氏著《楚辞集校·自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13页。

② 关于王逸及《楚辞章句》的研究，可以参看邓声国先生的《王逸〈楚辞章句〉考论》、许子滨先生的《王逸〈楚辞章句〉发微》二书。

善，尝忤秦桧而贬官，事具《宋史·儒林传》。其《楚辞补注》吸收了王逸以后郭璞《楚辞注》以及其他人的研究心得，对王逸的注解加以补充和纠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其书的特点与价值简介甚明：

案陈振孙《书录解题》列《补注楚辞》十七卷、《考异》一卷。称“兴祖少时，从柳展如得东坡手校十卷。凡诸本异同，皆两出之。后又得洪玉父而下本十四五家，参校遂为定本，始补王逸《章句》之未备者。成书又得姚廷辉本，作《考异》，附古本释文之后。又得欧阳永叔、孙莘老、苏子容本於关子东、叶少协，校正以补《考异》之遗”云云。则旧本兼载释文，而《考异》一卷附之，在《补注》十七卷之外。此本每卷之末有汲古后人毛表字奏叔依古本是正印记，而《考异》已散入各句下，未知谁所窜乱也。又目录后有兴祖《附记》，称鲍钦止云：“《辨骚》非《楚辞》本书，不当录。班固二序，旧在《九叹》之后，今附於第一通之末”云云。此本《离骚》之末有班固二序，与所记合。而刘勰《辨骚》一篇仍列序后，亦不详其何故。岂但言其不当录，而未敢遽删欤？汉人注书，大抵简质，又往往举其训诂，而不备列其考据。兴祖是编，列逸注於前，而一一疏通、证明、补注於后，於逸注多所阐发。又皆以“补曰”二字别之，使与原文不乱，亦异乎明代诸人妄改古书，恣情损益。於《楚辞》诸注之中，特为善本。故陈振孙称其用力之勤，而朱子作《集注》，亦多取其说云。

朱熹与洪兴祖同时，而长于理学。他对王注洪补太重名物训诂不甚满意，所以复作《楚辞集注》，重在阐发屈原作品的意旨。同时，王逸的《楚辞章句》保存了不少汉人仿效屈原的作品。朱熹认为这些汉人作品“辞气平缓，意不深切”，所以除《惜誓》、《哀时命》、

《招隐士》，他皆删去，同时又增添了贾谊的《吊屈原赋》、《鹏鸟赋》等篇什。从文学的角度说，朱熹的做法是有见地的。不过，《楚辞章句》保存的拟骚之作，基本是替屈原代言的，反映着汉人对屈原生平、思想以及文学创作的认识，是研究屈原的重要参考，不宜遗弃。

明清两代屈学甚盛，佳作较多。其中，明中叶汪瑗承朱熹之学风，其《楚辞集解》亦多新说。康乾时期，蒋骥所作《山带阁注楚辞》，参考群书达四百余种，不仅对楚辞字句诂训、文章义理有独到的议论，而且对屈原生平事迹、楚辞地理、作品系年也考订较详，很值得参阅。

延及近世，关于屈原作品的研究，数量更多。朱季海的《楚辞解故》、王泗原的《楚辞校释》以及蒋天枢的《楚辞校释》征引赅博，议论翔实，有乾嘉朴学之风。汤炳正主持的《楚辞今注》则是今注本中的翘楚。此外，陈子展的《楚辞直解》、萧兵的《楚辞全译》，在今注本中也值得参考。今人对屈原作品异文及零句做考证而成就较大的，有民初刘师培的《楚辞考异》、姜亮夫的《重订屈原赋校注》、闻一多的《楚辞校补》以及黄灵庚的《楚辞异文辩证》、《楚辞集校》。刘师培的研究属于筌路蓝缕，成果多为后者所承。黄氏之书晚出，搜罗宏富，对前人之研究亦颇能断以己意。黄氏另有《楚辞章句疏证》，校勘注疏亦颇可观。

至于其他类型的研究，欲了解历代楚辞研究概况，可以参阅洪湛侯主编的《楚辞要籍解题》，易重廉的《中国楚辞学史》、李大明的《汉楚辞学史》、孙巧云的《元明清楚辞学史》。欲了解当代楚辞研究进展，可参阅赵沛霖的《屈赋研究论衡》、黄震云的《楚辞通论》、金开诚的《屈原辞研究》。这三部书主要对屈原及楚辞研究中的各种问题，分门别类的进行综述和评价，并断以己见。此外，汤炳正的《屈赋新探》和《楚辞类稿》，长于屈子事迹的考索、楚辞文字的诂

训和屈赋名物的考证,成就很大。萧兵的《楚辞与神话》、《楚辞新探》、《楚辞文化》,从文化人类学、比较神话学角度研究楚辞,旁征博引,可资借鉴。日本藤野岩友的《巫系文学论》是最早的一部从巫文化角度来研究屈原及其作品的专著,亦值得参考。而美国人施耐德的《楚国狂人屈原与中国政治神话》则不妨看作是一部特殊视角下的屈原接受史。再有,崔富章、李大明等编有《楚辞集校集注》、《楚辞评论集览》、《楚辞著作提要》、《楚辞学通典》,由湖北教育出版社于2003年出版。这几本书是涵盖古今楚辞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虽校对不甚精审,但资料翔实,便于参考。若欲直接查检古今相关著述,则有黄灵庚主持刊行的《楚辞文献丛刊》,辑集自汉代至民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楚辞文献207种,可资利用。

以上所言,都是与屈原及其作品直接相关的研究著作,此外,还有其他一些研究先秦楚文化的文献,如宋公明主编的《楚国风俗志》、张正明的《楚文化史》之类,虽不是专门为屈原研究而作,但却对屈原之研究颇有助益,亦值得参看。此外,近时出土的战国时期的竹简书,如湖北郭店战国简、上海博物馆所藏战国简、清华大学所藏战国简也须参阅,因为它们都是楚简,而且流行的时间几乎与屈原同时代。

清代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曰:“仆闻事于经学,盖有三难,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研究楚辞亦有此三难。因此,读书一定要有方法。

首先,读书要有方圆。

方就是方向,就是角度。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而知识是无限的,庄子说:“以有涯随无涯,殆矣。”所以求知一定要有方向,有角度,不可过于散漫。古人自谦,常说自己的学术是一隅之见。其实,大学问却实在就是从一个个小角落里走出来的。在小角落里,知识相对来说,就是有限的。譬如屈原的作品不是难研究吗,但我

们可以只专力研究一篇。唐柳宗元的《天对》，宋杨万里的《天问天对解》，清毛奇龄的《天问补注》和丁晏的《天问笺》以及今人林庚的《天问论笺》都是如此。再有，也可以不研究一篇，而只研究一事。宋代吴仁杰的《离骚草木疏》，明屠本峻的《离骚草木疏补》，都只研究《楚辞》中的花草树木。清末俞樾也很聪明，他只作《离骚人名考》，收入《春在堂全书·俞楼杂纂》，主要考辨楚辞及汉人拟作中的人物鬼神，这也是很省气力而又容易见成绩的方法。今日我们来研究楚辞，可选的角度就更多了。文艺学、音乐学、人类学、神话学、历史学、心理学、文字学、植物学、地理学都有可以选择的角度。说到选角度，也有窍门。窍门就是要注意自己的兴趣、才能和所处的学术环境。其中学术环境比较紧要。要善于观察环境，然后衡量自己的才力、物力，再结合自己的兴趣选一个角度，这样来研究楚辞恐怕才有成绩，也才会有乐趣。如若好高骛远，恐怕虽一时激情不能自己，而其后终将半途而废或者劳而无功。

圆就是圆通、圆融。有方向有角度固然可以集中精力，但也容易限制视野，弄不好使人成为井底之蛙以至夜郎自大。苏东坡说得好：“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为了更好地认识所定角度内的问题，有时需要换个角度看问题。换的角度越多，知识自然也越发圆通。有一名人曾提倡一种渗透性读书法，他说：“当我们专心学习一门课程或潜心钻研一个课题时，如果有意识地把智慧的触角伸向邻近的知识领域，必然别有一番意境。在那些熟悉的知识链条中，如果嵌接上不熟悉知识链条中的一环，则很有可能得到意想不到的新发现。”这个方法很好。我们将之引入屈学领域，对于那些与屈原研究相邻近领域的书籍，如果时间和精力允许，不妨也拿来读一读，看一看。即便暂时弄不懂也不要紧，一些有价值的启示，也许正产生于半通不通之中。采用渗透性学习方法，会使我们的视野开阔，思路活跃，提高我们学习的效率。这种

渗透的实质,其实也就是泛读,就是用“博”来启发“专”。鲁迅先生《随便翻翻》一文说:“书在手上,不管它是什么,总要拿来翻一下,或者看一遍序目,或者读几页内容。”泛读一般就是如此,不可过于仔细,否则就喧宾夺主了。

其次,读书要有主仆。

所谓有主仆,谓读书要以著者功力之高下而分先后、分主次。宋代严羽《沧浪诗话》说,学诗要从李杜王孟学起。我们研究楚辞,也要从大家的文章、议论学起。在过去一百年屈学研究中,游国恩、姜亮夫、汤炳正、林庚先生的研究功绩最著。若能将此四家著作仔细披阅,认真品会,宜有事半功倍之效。当然,大家之作也常有不足,所以大家之外的著作也要读,只是要作补充来读,不要纠缠于其中,否则致远恐泥。严耕望先生曾结合自身经验指出:“好的书固然要参考,很坏的书也往往有一得之长,有可利用处,所以我的书架上也有品质很低劣的书。不过我在此要提醒青年学人们一句话,自己学术基础尚未巩固时,千万不要乱看,一定要选择标准高的好书看,千万不能常常看品质低劣的书。因为自己辨别的能力尚不够,很容易受到劣书的影响,走不上正轨……等到你的根基已很稳固,遇到劣书,倒也不妨翻着看看,也可能有一点用处。”^①

读书的主仆与读书的方圆一样,其实都涉及精读与泛读的问题。只不过方圆是从研究的内容上来划分精读与泛读,是横的;而主仆是从著者的功力来划分精读与泛读,是纵的。很显然,主人是越少越好,仆人是越多越妙。所以精读一定要专精,而泛读一定要广泛。

其三,读书要有迂回。

^① 严耕望:《治史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90页。

无论是精读还是泛读,总有些书读起来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读书就不能不讲迂回。同样是大家之作,有的比较容易读,有的则较难。对于有毅力又有师友可资请益的人来说,先难后易也许是好的。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若能先登顶泰山,那东山也就不足为虑了。不过,对大多数人来讲,读书主要靠自己。所以先从简单一点的书读起,然后再看内容艰深的书,也许是更好的办法。不过,再简单的书,也总有些内容在书中是比较难以理解的。这时候,不妨迂回作战,先越过那些艰涩的内容,直接往下读。有些风景绕过去看才优美,有些问题回过头看更明晰。鲁迅曾说过:“若是碰到疑问而只看那个地方,那么无论看多久都不会懂。所以跳过去,再向前进,于是连以前的地方都明白了。”这种读书方法的要旨就是先易后难、避实击虚。子曰:“温故而知新。”有时候温故不是为知新,而是要把原先没看懂的内容再看一看,想一想,所谓读书百遍,其义自见。不过,这一百遍不能连着,中间要有停歇,使思维休息一段时间,这样的效果要更好些,因为有些内容的理解需要读另外一些书籍,有些内容的理解更需要一定的社会阅历。所以,勤读不等于马不停蹄地读。据说马克思阅读社会科学著作疲劳时,就改读诗歌以休息大脑,这也是个迂回作战的好方法。

最后,读书要有计划。

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如果读书是为了消遣,或是为了享受,那自然不需要用计划来煞风景。但假使读书是为了立言,是为了取得成果,那就不能不作计划。不善于计划的学者很容易断送自己的才华。尤其是文人才子气较浓的人,情志易于波动,精力易于分散,不能沉潜专一,则更要注意早作计划,并持之以恒。否则,怕只能老坐高天咏寒柳,无限江山付来生了。

作计划的时候,长期的筹划与短期的考量,都是必须的。《曹

辩论战》有一鼓作气之说，读书作计划也应注意怎样保持精神。一般来说，年轻人的计划不要过于宏大，即使作了宏大的计划，也应该将其进一步划分为若干短时期的计划。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如果能将千里之行的每一里都当作远足的一个目标，那么胜利几乎随时可以预期。再艰难的事儿因而也就变得极为容易。严耕望先生大学时代有一佳友名钱树棠，二人在抗战时期皆在成都齐鲁大学从学于钱穆。树棠之天分、勤力和旧学根柢皆强于耕望，当时人称钱为大书橱，严为二书橱，多以为耕望不及树棠。然钱穆乃谓树棠前途不如耕望，原因在于：“树棠个性执着，程度虽好，但很难发得开。”^①其后，树棠的成就果远不及耕望。钱树棠能背诵《汉书·地理志》，有志于研究秦汉人文地理，尝撰有短文《两汉的两都》，谓西汉长安是动态之都，东汉洛阳是静态之都。严耕望叹服其论甚高，然而也指出：“大约他后来只想写高境界的论文，不欲‘卑之无甚高论’，所以花了很大气力搜集几十万字的史料，也不想动笔，时间久了，自然锐气尽消！当然这仍是基于先生所谓执着之故。”^②据此来推想，大概所谓执着难发得开，其原因在于执着于一途的人不能变通，往往既不知旁行斜上，更不肯以退为进。其实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大学问也是小学问一点点积累而越堆越高的。旁行确乎是走了小道，退却确乎近于怯懦，然而这却正是为学宜有的态度和策略。所以读书定计划，不要只有宏大的目标而没有小规模の筹划。当然，计划也不能定得规模太小，太小容易失去方向，容易分散，如同散兵游勇，不能形成强大的战斗力以取得宏伟的战果。所以最好的读书计划就应像珠子被串成项链一样，大约应该是若干切实可行的小计算都

① 严耕望：《治史三书》，第249页。

② 同上。

集中在一个大的方向里。

此外,读书定计划也不要定得生硬死板,在该变通的时候一定要变通。自然,这不是说读书的计划可以随便地改来改去,那样的话也就不成其为计划了。

二 勤思

对于读书来讲,有什么都不如有思考重要。没有思考,我们就翻不出作者的牢笼,更不能达成新知。而对于一个研究者来说,新知才是最有价值的。为了达成新知,我们必须善于对所读书籍进行思考,

首先,我们读书要提纲挈领。

要超越书籍的作者,先要很好地掌握书籍的内容,而掌握书籍内容,莫过于提纲挈领。鲁迅说:拿到一本书,首先要简单地了解一下该书的结构和内容,然后向自己提出诸如“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的问题。鲁迅的这段话,显然也是要求读书应注意提纲挈领。

至于如何提纲挈领,最简便的办法当然是浏览目录与品读序言或者跋语。一般人知道看目录,却不注重序跋。其实序跋往往是作者对自己研究之动机、之基础、之成绩、之缺陷的说明,非常重要。当然,有时候序言是请别人写的。这样的序言有时只是客套,但有时也能旁观者清,说出该作品的优长与不足,所以亦值得重视。

此外,也有其他一些提纲挈领的办法。如据说,爱因斯坦读书讲究“总、分、合”三个步骤。所谓“总”,就是先对全书形成总体印象。在浏览前言、后记、编后等总述性东西的基础上,认真地阅读目录,概括了解全书的结构、体系、线索、内容和要点等。所谓“分”,就是在总体了解基础上,逐页却不是逐字地略读全文。在略

读中,则特别注意书中的重点、要点以及与自己需要密切相关的内容。所谓“合”,就是在略读全书后,把已经获得的印象条理化、系统化,使观点与材料有机结合。经过认真思考、综合,弄清全书的内在联系,以达到总结、深化、提高的目的。这个方法也不错,只是适用于精读书目,不可用于泛读。

其次,我们读书要知人论世。

我们读书,总希望找到书籍的局限与不足,而欲求其局限与不足,则就不能不“知人论世”,也就是说,不能不深入了解作者本人的情况以及作者所处时代的历史状况。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更加客观地把握作者提出的观点和认识。这乃是毋庸置疑的。

复次,我们读书要兼读则明。

一部好的书籍总会有自己的观点甚至思想的体系,要对书中提出的观点与思想作出正确的判断和深刻的评价,显然不是个容易的事情。尤其人们在论证问题的时候,或出于态度不够老实,或出于学识有限,文中一般总是开列有利于他的证据,而很少能够列出不利于他的反证。这时候,若非是行家里手,单看作者本人的文章是很难判断与取舍的。此时,最简单而有效的方法,就是找其论敌的著作一起比照着读。读者像法官一样,原告的、被告的文字都拿来,仔细比较他们的观点、证据和言辞,由此来分析各自的正误与不足。如果这样还不能断定是非,那就不妨扩展取证的范围,再多找几本相关著作来审读。鲁迅先生《随便翻翻》说:“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其言甚是。有些学术上的公案好破,有的永远也不能破案定罪。但即使你不能结案,也不必烦恼,因为至少你关于此案已积累了丰富的知识,而且或可以移作他用呢。

三 勤写

勤读可以使我们的知识淹博,勤思可以使我们的观点深刻,勤写